

《三国志玉玺传》研究综述

李昕洁

(郑州图书馆, 河南 郑州 450008)

摘要: 郑州图书馆馆藏清乾隆间抄本《三国志玉玺传》是此书传世的唯一足本。1986年此书整理出版以来, 已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关于这本书的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 学者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综合来看, 对此书的成书时间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对其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进行了总体考察; 此外, 对其语言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旨在梳理关于《三国志玉玺传》的研究, 以期推动此项研究多层次全方位地不断发展。

关键词: 《三国志玉玺传》; 三国故事; 郑州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I23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7X(2018)01-0069-03

《三国志玉玺传》一书过去从未刻印过, 只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 赵景深所藏残本仅存5卷(卷3、4、5、6和11)^{[1]127-128}。郑州图书馆所藏弹词《三国志玉玺传》20卷本是此书传世的唯一足本。50年代, 郑州图书馆从苏州购得这部清乾隆年间的抄本, 由童吉永、张万钧、周树德整理后, 于1986年出版。早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将这一足本出版之前, 这部书就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2-3], 已有学者依据所见残本, 称这部书记载了“较原始未经文人改动的三国故事”^{[1]128}。《三国志玉玺传》对三国小说的研究和弹词本身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此书出版以来, 受到了广大学者的注意, 据不完全统计, 发表在各类图书、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已有20余篇。具体说来, 这些研究可以大致分为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人物研究、语言研究四个方面。试分而述之。

一、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三国志玉玺传》文献方面的研究可谓成果显著, 异彩纷呈。学者们普遍认为此书底本形成时间应早于抄本所记载的誊抄时间, 即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二十年(1755), 大部分学者认为其大约成书于明代。相关论文可大致分为版本源流和成书年代考证两方面。

(一) 版本源流研究

学者们对于此书版本源流的研究可以认为从属于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这一长盛不衰的主题。童

吉永、张万钧、周树德在《三国志玉玺传》的前言里对本书底本的年代做了推测。他们比较了《三国志玉玺传》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嘉靖本)以及康熙时期的毛宗岗《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毛本), 认为相较于毛本, 《三国志玉玺传》所引的诗、转引的夹白和嘉靖本更为相似, 甚至一些唱词和夹白援用的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小字注。此外, 本书出现了“玄”“元”乱用等避讳不严的情况。综合这些现象来看, 《三国志玉玺传》可能成书于明代或明清之交。

《三国志玉玺传》也受到海外的三国研究者的关注, 对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来说, 《三国志玉玺传》所依据的母本也成为学者乐于考证的问题。英国学者魏安在他的著作《三国演义版本考》中依据各版本脱文情况把现存《三国演义》各版本分为ABCD几类, 他分析了《三国志玉玺传》中的50多首引自《三国演义》的诗、说白和唱文, 发现《三国志玉玺传》所收诗往往同于CD系统, 但也保留了AB系统的一些特点, 推测出它比现存叶逢春本更加接近CD系统祖本的样子, 他指出《三国志玉玺传》大概是依据嘉靖以前较早的闽本写成, 并以抄本的形式传到了清代。日本学者中川谕把《三国演义》现存的40多种版本分为3个系统, 即24卷系统、20卷繁本系统和20卷简本系统, 其中, 20卷简本系统又细分为《志传》小系统和《英雄志传》小系统^[4]。他在《清代的三国通俗文艺与〈三国演义〉》中把《三国志玉玺传》与这几个版本的

收稿日期: 2017-06-13

作者简介: 李昕洁(1987-), 女, 河北唐山人, 助理研究员, 硕士。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566.C.20180104.0935.008.html>

具体情节和文字描写进行比对,发现此书更接近于20卷繁本系统或20卷简本《英雄志传》小系统,受到简本《英雄志传》小系统的影响更大,而产生于康熙年间毛本对此书没什么影响。清乾隆年间的抄本《三国志玉玺传》证明清代中前期社会上持续流行的是明代以来的版本,而非刚刚产生的毛本(《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1辑)。

(二)成书年代考证

除版本源流研究以外,学者们还通过对《三国志玉玺传》的细节进行考证,试图以此判定其成书年代。

陈辽曾多次在论文中论及《三国志玉玺传》的成书年代。他比较了郑世容刊本的《三国志传》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玉玺传》说白文字对应之处,发现《三国志玉玺传》的文字最为简朴,且有很多地方和这两个版本不相符。同时,在《三国志玉玺传》总共76段说白之中,有三段为此书独有。据此,他判断《三国志玉玺传》另有所本。同时,他通过对朝鲜文书的考察,发现“知会”一词在元末明初之际词义扩大,明代成为流行语,例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知会”就多次出现。然而,《三国志玉玺传》无论是说白还是唱词中未出现“知会”一词。于是,他指出,《三国志玉玺传》的底本产生很早,推测大约产生于1358年至1368年之间,“是《三国志平话》和罗贯中《三国》底本之间的过渡本”^[5-7]。

龚敏留意到《三国志玉玺传》中采纳了除三国故事以外的许多其他文学作品,论文《弹词〈三国志玉玺传〉的来源和成书时间考略》抓住《三国志玉玺传》中貂蝉善于跳“观音舞”这一线索,就“观音舞”的产生和流行时间,利用时人小说和笔记进行考察,发现“观音舞”是明代万历末年以前一般宴饮和迎春活动中常见的舞蹈,但在明末已不再流行,因此《三国志玉玺传》应成书于明代(《止善》2010年第8期)。

二、比较研究

在比较研究方面,学者较为青睐的做法是把《三国志玉玺传》与其它小说之间作比较,探究其如何把三国故事改造得让民众喜闻乐见,并寻找其与其它通俗小说的相似之处。

(一)文本研究

张弦生(即弦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玉玺传〉》将《三国志玉玺传》与嘉靖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文本作比较,认为《三国志玉玺

传》“大半以上的内容是演述《通俗演义》前17卷的故事”^[8]。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三国志玉玺传》增添的故事的篇幅巨大,超过全书总字数的1/5,这部作品根据嘉靖本和其他文艺作品、民间传说进行再创作,加入了民众喜欢看的人物故事(《殷都学刊》1988年第1期)。

童李君的《弹词与小说的区别——以〈三国志玉玺传〉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为例》比较了《三国志玉玺传》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同一情节或同一人物描写的侧重点,认为相较而言《三国志玉玺传》内容上对女性描摹更注重,对心里描写更细腻(《作家杂志》2010年第5期)。

还有学者找到了《三国志玉玺传》的其他蓝本。龚敏通过《三国志玉玺传》中的曲名“锁南枝”,找到卷3吕布貂蝉凤仪亭相会时的曲来自昆曲《连环计·掷戟》(《止善》2010年第8期)。也有学者认为《三国志玉玺传》为后来的小说借鉴。韩霄的博士论文《三国故事说唱文学研究》把《三国志玉玺传》与《红楼梦》做比较,认为二者在叙事结构和悲剧意蕴上具有相似之处(扬州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二)作品定性

部分学者从《三国志玉玺传》的叙事方式中归纳出一些民间文学的特点。

王丽娟的《文人之“忠”与民间之“义”——桃园结义故事两种叙事的比较分析》对涉及到桃园结义这一情节的一个文人叙事文本和包括《三国志玉玺传》在内的7个民间叙事文本进行比较,认为《三国志玉玺传》作为体现民间视角的弹词,向读者展示了具有草莽气质的英雄人物,体现了精英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差别(《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1期)。

纪德君的《演绎〈三国志〉,弹唱儿女情——弹词〈三国志玉玺传〉试论》认为《三国志玉玺传》与嘉靖壬午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对战争描写进行淡化处理,增加了大量的爱情婚姻故事,体现出女性叙事的特点(《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在他的另一篇论文《艺人小说、书贾小说与文人小说》中,《三国志玉玺传》被作为“艺人根据小说原著重加演绎的作品”的代表,体现了艺人小说塑造人物时喜欢走传奇化、夸大化路子的特点^[9]。

三、人物研究

对于《三国志玉玺传》中人物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讨论其对神化的英雄和女性描写两方面。

(一) 英雄神化

对关羽这一人物形象进行研究是学者观察《三国志玉玺传》时较为青睐的角度。刘海燕的论文《〈三国志玉玺传〉的形象构拟与叙事策略——以关羽为考察对象》认为在关羽形象的塑造上,《三国志玉玺传》给三国故事加上了人情和神话的叙事。这样的改写反映出说唱文学对历史进行了民间诠释,给历史人物加上了平民百姓的世俗情感,并且把英雄人物神化,用以解释他们超出凡人的权力和地位(《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王丽娟的论文《元明民间叙事文本中关羽的另类形象》中把《三国志玉玺传》对关羽的描写作为民间叙事的一个例子,证明与文人叙事相比,民间叙事的描写以娱乐为主要目的。

(二) 女性描写

与其他三国故事相比,《三国志玉玺传》的特点是增加了很多对女性和心理的描写,给刘备这一人物设计了许多才子佳人式的故事,并花了大量的笔墨去渲染这些故事。这种特点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张弦生有多篇论文谈到的《三国志玉玺传》中的女性。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玉玺传〉》这篇论文从总体上分析了《三国志玉玺传》对女性的描写,还在《〈三国志玉玺传〉中的东吴女性描写》(《富春江畔话三国》,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1月版)和《刘备的五位夫人——〈三国志玉玺传〉中的女性描写》(《黄鹤楼前论三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分别从侧面展示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屈辱地位和悲剧命运。

单长江的《论刘备妻妾的婚姻悲剧》单独分析了《三国志玉玺传》中孙万金和邢姣花两个人物,认为这部作品从特殊的视角展示了古代贵族妇女沦为政治工具的悲情人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四、语言研究

这方面研究较为匮乏,只有张弦生从《三国志玉玺传》真、广、蒸、侵韵混用和舌前鼻音和舌根鼻音不分的特征,判定此书并非文人创作,而是传唱于吴语区的国音弹词(《〈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玉玺传〉》)。魏安分析了《三国志玉玺传》的格律,认为其与明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无异。并且文中多次用“词文”称呼,推测《三国志玉玺传》

为明代长篇词话,原名应为《三国词文》^[10]。

综观学者们对于《三国志玉玺传》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版本源流研究和成书年代考证等文献研究,在文本研究和作品定性等比较研究,在英雄神化和女性描写等人物研究,在语言研究等方面,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以说,研究角度多样,研究层面丰富,取得了很大进展。《三国志玉玺传》研究对于三国故事的母本,毛本的流传情况以及对元明清社会风俗、用语的研究都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对于此书的研究近几年来选题重复现象日益突出,传统热点人物研究数量虽多,但在深度上缺乏突破。至于最基础的文献研究,在近年来论文数量相对滞后。即便有这些缺憾存在,成就依旧是主要的,相信不久依然会有值得期待的作品出现。

参考文献:

- [1] 谭正璧. 谭正璧学术著作集: 11(评弹通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2] 谭正璧, 谭寻. 弹词叙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40.
- [3] 陈翔华. 明清以来的三国说唱文学——兼说它与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关系[G]//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三国志演义》论文集.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403-405.
- [4] 中川谕. 清代的三国通俗文艺与《三国志演义》[J]. 中国文学研究, 2008(1): 36-49.
- [5] 陈辽. 由弹词《三国志玉玺传》谈罗贯中的《三国》原本[J]. 中华文化论坛, 2007(3): 95-99.
- [6] 陈辽. 陈辽文存: 第八卷[M]. 香港: 香港银河出版社, 2009: 66-76.
- [7] 陈辽. 陈辽文存: 第九卷[M]. 香港: 香港银河出版社, 2011: 17-27.
- [8] 弦声. 《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玉玺传》[J]. 殷都学刊, 1988(1): 76-81.
- [9] 纪德君. 演绎《三国志》, 弹唱儿女情——弹词《三国志玉玺传》试论[J]. 文化遗产, 2009(3): 70-76.
- [10] 魏安. 三国演义版本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134-136.

(责任编辑: 叶景林)